

用，可以概括得更加全面而确切；三、对仿拟格跟对 的认识。

比格、双关格、镶嵌格、序换格的关系可以有一个正确

清季光绪甲午状元张謇“夺魁”小考

吴仁安

《文史知识》1984年9月号上刊登一篇题为《从状元到资本家的张謇》的文章，其中谈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春，张謇迫于父命再次进京参加会试。他本来已无信心，却不想高中一甲一名，循例授翰林院修撰。”（文中重点系笔者所加）对于张謇在清季光绪甲午年高中状元一事，在本世纪80年代中期，在《青年一代》、《书林》等通俗读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张謇生平的文章也大都持类似观点，或者说他原来淡泊功名，或者说他那次参加会试本无信心，完全是任着个人超众的文才而春风得意，殿试夺魁。然而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

晚清的光绪甲午状元张謇，字季育，号啬庵，江苏南通人，生于清朝咸丰三年（1853年）。张謇五岁入塾读书，十六岁中秀才，三十三岁时参加顺天府乙酉科乡试，被录取为第二名。可在他中举后的场屋生涯却是坎坷曲折，屡遭蹉跌。从1885年到1894年的整整十年当中，张謇四次赴京参加会试，均是名落孙山。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四月，张謇抱着侥幸一试的渺茫希望，最后一次赴京参加会试。这一次，主要是靠了翁同龢的鼎助，张謇才能会试得售。翁同龢是南派“清流”的盟主，他和当时那些以清议见长的士大夫们一样，幻想通过年轻好学的光绪皇帝来实现他们的革新内政、抵御外侮的抱负。为此目的，翁同龢广泛延揽人才，看中了才华洋溢的张謇。光绪十一年（1885年）乙酉科顺天乡试，潘祖荫是正主考，翁同龢为副主考，根据张謇自订年谱记述：“（光绪十一年）九月十一日，听录，中第二。潘、翁二师期许甚至。翁尚书先见予优贡试卷，试前知余寓距其宅不远，访余于庙（张謇在京参加顺天终试时寄寓于关帝庙内——引者）。余一答谢。潘师命为乡试录前序，翁师命为后序。”此后，张謇与副主考的翁同龢便正式结成了师生关系。由于种种原因，翁同龢在张謇中举后连续四次会试时均未能把张謇取中为进士。所以到了甲午殿试时，翁同龢想方设法一定要把状元的桂冠给张謇戴上（其时潘祖荫已经故世）。但是，光绪甲午殿试时，钦派的阅卷大臣是以东阁大学士张之万为首，其次是旗人显贵麟书，再次为协办李鸿藻，翁同龢居第四，志锐则为第八。阅卷大臣们之间争夺“三鼎甲”（特别是争夺“状头”的斗争十分激烈。麟书说：“吾序次第二，状元卷吾不争，榜眼卷吾亦不让。”原来，清代殿试的八大臣阅卷评比，大多例以阅卷大臣之次序定其所阅试卷甲第之次序，所谓“公同阅定”云云，全都是堂皇的门面话而已。当时翁同龢必欲将张謇卷置诸第一，但却遭到张之万的激烈反对，李鸿藻则极力推荐沈卫的试卷，认为“如此佳卷”、“通场所无”，想定沈卫为状元。而张之万等三人，又都是翁同龢的老前辈。在此种情况下，张謇不仅不能“独占鳌头”，恐怕连榜眼、探花也都无望。但是，翁同龢却坚持己见，力排众议，一定要使张謇当上状元公。正当大家相持不下时，李鸿藻出来成全了张謇。李鸿藻自愿将他所拟定的状元（即沈卫）放弃，并力劝张之万也不必固执己见（张之万拟定郑叔进为状元）。原来，张謇甲午会试中式，李鸿藻是正总裁，张謇既是翁同龢之桃李，亦复为李鸿藻之门生。在光绪甲午殿试之前，张謇已与李鸿藻频繁接近，翁同龢又极力为之联络延誉，造成了联合对头张之万的局面，致使张之万孤掌难鸣，乃勉如翁同龢之意。又因为麟书坚决不肯让出其所取定的榜眼（尹铭绶）之故，最后张之万亦就只得无可奈何地将自己原来拟定的郑叔进改为探花。

那么，张謇的试卷又是怎样刚巧分到翁同龢之手的呢？据近人柴小梵的《梵天庐丛录》卷八记载：翁同龢事先关照“收掌”（收卷官）黄思永（翁同龢的门生之一，光绪庚辰科状元，任翰林院修撰，甲午殿试派充为收卷官，他是张謇的旧识）坐候张謇交卷。张謇交卷后出试场，黄思永展阅张卷，见文中有空白一字，黄乃取怀中笔

墨为之补书。后发现张卷中又有抬头错误，恩字误作单抬，黄复于恩字上补一“圣”字。补成之后，黄即刻将张卷直接送到翁同龢手里。翁同龢匆匆审阅了张謇试卷后，迅即得出“文气甚老，字亦雅，非常手也”的结论。于是，“难产”的南通状元终于产生了。

张謇大魁天下后，他通州的乡亲们即把南通水月阁魁星楼改名为“果然亭”，以示庆贺当地出了“文曲星”，且题了一副对联：

画槛欲凌风，风月无边归小阁；

锦标今夺得，文章有价属崇川。

但是张謇在1917年重修此亭时则又把“果然亭”改作“适然亭”，还把对联改为：

世间科第与风汉 槛外云山是故人

张謇又题了一段跋语云：“余以清甲午成进士，州牧邦人撷唐圣肇诗语为果然亭。世间万事得其适然耳，丁巳余修此亭不敢承前意也。适然之事，以适然视之。适得涪翁书，遂以易榜。”张謇自己心中十分明白，他的“状元”是“适逢其会”，完全是仰仗了翁同龢、李鸿藻这两位“恩师”的鼎助（特别是靠了翁的力争）才夺得的。翁同龢等“清流”们呢？因他们既无兵力，又没财权，故只能依靠手头仅有的一点录取权力来选拔一些人才，增强一点实力。

析培根《论说文集》

张家平

弗兰西斯·培根，不仅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个散文家，其代表作便是他的《论说文集》。

阅读《论说文集》首先给人的强烈印象是培根思想的深刻性。培根生活在文艺复兴这一特定的历史转折时期，中世纪根深蒂固，新世纪顽强奋进，新旧交替，良莠繁杂。培根以他深邃的日光注视着现实社会，对历史与现状作了科学与辩证的分析，并以严密的论证证明自己的论点。他在《论说文集》中所阐明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有力武器。

例如培根对知识问题的阐述。培根提出了著名的格言：“知识就是力量”。这一格言的提出，不仅使培根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揭示知识真正意义的人，而且由于这一格言肯定了人的力量来自知识，从而否定了神的力量，因此成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作斗争的重要思想武器之一，也是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培根《论说文集》中的《论真理》、《论学问》、《论游历》等篇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培根有关这方面的论述。培根的论述不仅涉及了传统的认识论，即认识的起源、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认识的真理性标准等问题，而且还涉及了科学学的范畴，如知识的价值、知识的社会功能等

等。

在《论学问》中，培根讲：“富于经验的人善于实行，也许能够对个别的事情一件件地加以判断，但是最好的有关大体的议论和对事务的计划与布置，乃是从有学问的人来的。”又说：“学问锻炼天性，而其本身又受经验底锻炼；盖人底天赋有如野生的花草，他们需要学问底修剪；而学问底本身，若不受经验底限制，则其所指示的未免过于笼统。”在这简短的两节话中，培根以唯物的、辩证的观点阐述了以下问题：1、知识的来源。知识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实践经验是第一性的，是知识的基础。作为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是非常重视实践的。这一点，在培根的《论游历》中同样可以看到。培根鼓励年青人外出游历，他认为游历是年青人教育的一部分，是获取知识的途径之一。他要求年青人凡到一地游历要和当地人一起吃饭、生活，与这一国家的人交新朋友，一定要在语言上设法沟通，然后深入到新环境的内部去，全面了解这一国家的政治、宗教。可见，培根是十分重视实践并把实践作为知识的来源的。2、知识与经验（实践）的关系。从上面所引的《论游历》的两段话中，不难看出培根对两者关系的归结：知识是对经验的总结，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之上的一种智能；同时，知识又必须受到经验的